

· “区域史研究”笔谈 ·

碎片化与全视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

高福顺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区域史越来越受到史学界重视,当代史学家热衷于试图将中国历史从空间上分解成更为细小的研究单位,对单位内的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要素进行实证性与理论性研究。不过,由于史学家的教育背景、传承渊源、学理依据、学术宗旨、现实诉求之不同以及对西方传入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与运用,区域史研究模式与宗旨往往出现较大差异,导致实证性与理论性上的争鸣,简言之,实质上就是碎片化与全视野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故此,考量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显然成为当下史学界必须关注、思考的论题,拙见以为趋异与趋同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碎片化是区域史研究的必然趋势、全视野是区域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勃兴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地方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二是西方区域史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介入。中国区域史在本土与外来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展现出了既有脱离传统地方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窠臼,又有别于西方区域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史定位。众所周知,区域史的最大特征就在于空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时间的单向性相比,空间具有多向性与特殊性,空间差异性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思想为转移。空间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如何制约人类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如何与人类互动,又如何随着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完成这一互动模式以及互动内容的不断转化与变迁,这正是区域史研究的魅力所在。^①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边疆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时不难发现,统治者针对不同区域所施行的治理举措大不相同,有的设置行政机构直接治理,有的设置道、属国、属郡、羁縻府州等间接治理,有的册封王号、汗号等顺势而治,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边疆民族区域为何会出现歧异的治理模式,恐怕是缘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所产生的政治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故在探寻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就必须关照区域的差异性。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治边的基本模式与总体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趋异性研究与趋同性研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两者是反向思维

收稿日期: 2014-03-13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10JZD0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13&ZD105)

作者简介: 高福顺,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 宋卿, 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东北地方史; 武玉环,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辽金史; 杨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东北地方史、辽金史; 王万志, 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辽金史; 赵英兰,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区域社会史。

① 戴一峰 《区域史研究的困惑: 方法论与范畴论》, 《天津社会科学》, 2010年第1期。

与相向思维的辩证统一。美国汉学家柯文指出“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①由此看来，将趋异性与趋同性作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趋异性的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成为关键因素，通过琐碎问题考据或研究之结论的集合寻求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的、内在的规律，寻求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这难免会出现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有关史学碎片化，《近代史研究》于2012年第4期、第5期连续刊发两组史学家笔谈文章专门讨论，尽管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拙见以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是区域史研究的方向所在。梁启超先生说“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許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②尽管此论不是专门针对区域史而言，却为致力于区域史研究的史学家指明了研究方向——碎片化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有些细小问题的记述并非相当清楚，譬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性质、儒学教育开展的规模与途径、人口构成的类型与比重等皆需实证性的考据或研究，唯有此类问题弄清楚，才会构建起边疆民族区域治理的总体模式，故此边疆治理的碎片化研究之必要性不言而喻。除边疆治理，其他区域史研究亦无一例外，随着史学研究的“精耕细作”，从前不曾被史学家关注的细小问题而现在却得到相当关注，并有众多成果问世。正是此类细小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才使得史学界能够有条件实现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可能性——整体史研究的实现。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指出“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史学家“理想的状况是，单个的历史学家应该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间的联系。”^③罗志田先生亦指出“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④区域史研究不是为了碎片化而碎片化，是为了碎片化集合后的探索，只有从细小问题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清楚细节，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不是会通。只有会通，区域史的碎片化研究才变得有意义，才真正实现了碎片化研究的宗旨与价值。

在趋同性的研究过程中，理性认识成为关键因素，无论是区域史的碎片化研究，还是总体（整体）史观关照下的区域史研究，欲达成切合历史实际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认识，都必须作全视野、长时段的考察，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论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过程中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实现的前提是活动于中国域内的诸民族必须具有一致的儒家文化认同心态，只有诸民族形成儒家文化大一统认同意识，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要素的构成与体系才会形成有机整体，才会有共同认识价值的互动，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发展。如何完成本质性的、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并非通过对一两个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研究就能获得，而需要从更多王朝边疆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总结出来。严耕望先生说“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⑤区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需要一个全视野、长时段的考察，才更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故此，区域史研究的全视野、长时段的观察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领域，程妮娜教授主编的《中国地方史纲》可称得上是区域史研究的新的尝

①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③ [英]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⑤ 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试,它体现了“碎片化”与“全视野”关照下的理性思考,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其泰先生的评论:是书是“探索几千年来中国作为统一国家不断发展与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演进之间,所形成的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依存和制约的复杂进程,探索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之间辩证的、互动的发展关系。”^①这种“挣脱了身份认同、空间和地点这些传统叙事的形而上学包袱”^②来探索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及其价值取向无疑是中国区域史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

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

宋 卿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营州(今辽宁朝阳)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设置的唯一内地型府州,也是唐王朝设于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该地自然地理位置特殊,正位于中原、东北、北方草原的交汇处,也是中央王朝与朝鲜半岛诸国、日本等交流往来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营州内民族杂居,有汉人、高丽、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粟特、新罗等,且少数民族占据主体,其数量呈日益增多趋势;^③营州外(辖区内)亦“境连边奥,地接戎藩”^④西北与契丹、奚毗邻,东与高丽毗邻,东北与渤海、靺鞨等毗邻,诸少数民族聚居区毗邻营州,民族关系复杂。

作为唐代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营州的建置、官署机构都表现出与内地正州不同的特点,营州及营州辖区内具有多种形式地方行政建置并存的特点,既有设于汉族聚居区的正州,也有设于内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城傍羁縻州,监管区亦有设于少数民族原居地的羁縻府州,不同形式的州县建置共同隶属于设于营州的官署机构。唐王朝设于营州的官署机构,相继有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府等。营州总管府是营州都督府的前身,营州都督府历经几次盛衰变迁,其地“侷得侷失”;^⑤平卢节度使府也在东北边疆形势的变化中诞生、壮大、衰落,乃至移徙他处。营州政府代表中央施行地方管辖权,对辖下诸州具有行政、经济、军事等各项职能,其权力经历了鼎盛、弱化、再次鼎盛、没落的变化。

武德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618—696),是营州政府第一次权力鼎盛时期。魏征曾言“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⑥此语道出了中央统治者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根本要义。唐太宗听从魏征劝告,“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从而“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⑦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将前朝的羁縻政策制度化、体系化。从武德元年设置燕州安置粟末靺鞨开始,唐王朝先后在营州内设置18个城

① 程妮娜主编《中国地方史纲·序》,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法]S·罗密·穆克尔吉《碎片与裂变:迈向全球政治人类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1期,第20页。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营州边疆治理与东北亚区域稳定研究”(12CZS06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营州边疆管理与东北亚区域稳定研究”(2012B16);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唐代地方管理与社会稳定研究——以营州为视角”(2011ZZ044)成果。

③ 宋卿《安史乱前唐代营州民族人口探析》,《欧亚学刊》,2012年第10辑。

④ 《朝阳杨律墓志铭》,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⑤ (清)和珅、梁国志等纂修《钦定热河志》卷八七《人物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⑥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⑦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58页。